

权力三弄：潘雨桐与商晚筠小说的性政治秀

陈颖萱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中文文学硕士生

摘要

在马华小说家中，潘雨桐与商晚筠在书写笔调、创作背景、文字功力等方面可谓相当近似。他们的小说也共同表现了性政治现象。“性政治”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其同题著作中提出的概念。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着的权力不公的问题，正说明了米利特所主张的“性即是政治”。从性别角度来看，米利特的性政治概念有助于梳理潘雨桐与商晚筠小说的性别议题。本文将从梳理性政治形式开始，进而分析形成性政治之元素，以探讨潘雨桐与商晚筠小说中的性政治秀。

关键词：潘雨桐、商晚筠、性政治、女性人物

**The sexual political issues in Pan-Yutong's and Shang-Wanyun's
selected short stories**

CHIN Ying Xuan

Master of Art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Abstract

Pan-Yutong and Shang-Wanyun have similar writing styles among Chinese Malaysian writers. Their short stories concern about the issue of sexual politics. Sexual Politics was introduced by Kate Millett in 1970s. Millett was the first scholar who argues about the neglected political aspects between men and women. By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sexual politics,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sexual political issues found in short stories by Pan-Yutong and Shang-Wanyun.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forms and elements of sexual politics issue in Pan-Yutong's and Shang-Wanyun's writing styles.

Keywords: Pan-Yutong, Shang-Wanyun, Sexual Politics, Female character

一、前言

在马华小说家中，潘雨桐与商晚筠在书写笔调、创作背景、文字功力等方面可谓相当近似。学界对他们的讨论向来多集中于族群、乡土、书写技巧等面向，近来也有学者开始注意他们作品中的性别议题，然却鲜少将之相提并议。只要仔细观察，可发现他们小说中的性别议题实有相似之处，即都共同表现了性政治现象。

“性政治”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其问题著作中提出的概念。她认为若政治体现为“人类某一集团用来支配另一集团的那些具有权力结构的关系和组合”（米利特，1999，页36），两性之间的关系即存在政治因素。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着的权力不公的问题，正说明了米利特所主张“性即是政治”。

潘雨桐与商晚筠小说的性政治现象主要以三种形式来体现，本文将它们分别称为直线式、金字塔式，和倒金字塔形式。直线式性政治形式（Linear Model Of Sexual Politics）直接道出一个权力单位支配单一个体的事实；金字塔性政治形式（Pyramidal Sexual Politics）则描绘一个权力单位同时或前后支配多个个体的图像；然而，倒金字塔性政治形式（Inverted Pyramid Sexual Politics）勾勒出多个权力单位同时或前后支配单一个体的图形。

从性别角度来看，米利特的性政治概念有助于梳理潘雨桐与商晚筠小说的性别议题。本文将从梳理性政治形式开始，进而分析形成性政治之元素，以探讨潘雨桐与商晚筠小说中的性政治秀。

二、性政治形式

直线式性政治形式在潘雨桐与商晚筠小说中最为常见。在此形式中，女性被男性控制、利用、占有是支配的常态。男性控制女性，包括控制她们的人生与人身自由，甚至她们发言的权力。除此之外，他们更利用女性来为他们生产经济效益。

潘雨桐与商晚筠早期的小说，经常热衷表现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在外公干的丈夫籍由供给家用便得以支配持家太太的所有行动。潘雨桐《一水天涯》的林月云，商晚筠《秘密》的静青，还有《云深不知处》的颜桥都是家庭主妇。她们依靠丈夫的经济支配度日，丈夫是她们生活的中心，她们围绕着丈夫运转。然而她们的丈夫则把她们当玩具一样收藏在家，等待忙碌完毕再回家赏玩。

静青的丈夫把静青娶回他那以金钱与物质建构的家，但自己却经常不在，只留给静青成堆空白寂寞的日子。当他在家时，静青必须什么都顺从他。对于丈夫的要求，静青只能如此反应：“不能拒绝他了。他是丈夫，我是妻子”（商晚筠，1975，页63）。至于颜桥，她丈夫给她车子房子还有年度旅行。而她则整天待在家里，当她丈夫的御用厨娘为他做饭。静青和颜桥表面上看似婚姻幸福、生活美满、经济无忧。实际上却只是一只笼中鸟。“家”是她们丈夫编织的笼，她们像宠物一样乖乖呆在里头等待丈夫回来赏玩。另外，随丈夫从台湾远嫁大马的林月云，她则像丈夫的盆栽一样。因为丈夫执意返马工作，她被移植来马十多年。后来，为了丈夫要到他乡发展，她又被迫带着女儿返回台湾。林月云的来去皆被支配她经济开销的丈夫所控制。

对于女性的支配不仅是行动上的控制。事实上，父权社会话语霸权的强大支配则更彻底剥夺了妇女的话语权与选择权。商晚筠《林容伯来晚餐》的秋妹和《寂寞的街道》里阿文的母亲，她们皆不能发声，更不能为自己发声。阿文的父亲成为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后，也连带成为家里唯一的发言人。他剥夺妻子的发言权来壮大自己的话语声势。阿文父亲阻止妻子在他与儿子的对话之间打岔。另外，他还呼喝妻子不许用过去的外号称呼现今已当上校长的朋友。除此之外，他更在妻子面前代表妻子向儿子发言，数落她不争气，说她拖了一身风湿又吝啬那点医药费。然而，秋妹则被其家婆剥夺了选择权。崇尚男性至上、认为妻子必须服侍丈夫乃至一家大小的秋妹家婆，是父权社会话语霸权的代表。她的家规家矩就像霸王颁布的命令，只要她一声令下秋妹则必须什么都听顺她的话。她不喜欢马来纱笼，秋妹就必须身穿她亲手挑拣的上海装布料。她喜欢男女与长幼有序，秋妹就必须每天先让丈夫与孩子吃饭自己最后才用餐。从父权制与话语霸权的角度思考，阿文父亲与秋妹家婆都是直线式性政治的支配者。

潘雨桐《天凉好个秋》的伍时勳，还有《野店》的林阿成则不只是支配者，更是彻底利用女性的剥削者。不管明媒正娶还是强行侵犯，他们皆处心积虑只为自己的生意与钱途着想。伍时勳这边厢刚诀别了过世的太太，另一边厢便有条件的迎娶束庆怡为妻。他不是为了美色更甯言爱。他“首先考虑的是功利”（潘雨桐，1987，页77），他要利用束庆怡来帮忙照顾醉琼楼与喜相逢的餐厅生意，还有照顾家里那两个小孩。不经营餐厅却经营杂货店的林阿成，他背着西马的太太在东马私藏了另一个女人——苏丝玛。说是“私藏”，林阿成的举动更应该是性、劳力、身体与人身自由的侵犯。性侵苏丝玛后，林阿成把她留在身边为自己的杂货店打杂。乃至以后由苏丝玛生下的孩子也顺理成章成了林阿成的资产，帮着林阿成顾店。对此，学者林春美曾经提出：“苏丝玛被林阿成强行侵占了肉体后，整个的就成了‘他的人’——归属他的名下，服务于他的性与积累财富的欲望，生殖力和劳动力全归他所有”（2009a，页97）。就利用与侵占的观点来看，伍时勳与林阿成皆是直线式性政治的共犯。

有别于直线式性政治形式，金字塔式性政治形式是潘雨桐与商晚筠笔下较罕见的性政治形式。一位男性同时或前后支配超过一位女性的故事，是此形式固定不变的模型。在此形式中，男性支配女性主要为了达至两个面向的满足。第一是对于女性年轻美丽的性与身体的追求。第二则是对于女性廉价劳动力与主动陪伴的渴望。

潘雨桐《烟锁重楼》的凌浩天，与《东谷岁月》的高若民，他们都是喜新厌旧贪图女色的男人。年轻时，他们把与他们一样年轻貌美的妻当作至宝奋力追求。中年后，他们却拒绝接受妻子也如同他们一样慢慢变老，美貌渐失的事实。他们因此婚姻出轨，另寻新欢。凌浩天前后支配了妻子杨可璐与情妇叶若兰的年轻美貌，还有她们的性与身体。当年，在晨光中长发飘荡鼻子小巧嘴唇丰厚的杨可璐是凌浩天赞美的对象。当她年岁渐长、身材变胖、长发已剪，凌浩天便转而追求正值青春年华仿佛年轻版杨可璐的叶若兰。凌浩天先后占有她们的美色并连带主导她们的性生活。他强制她们必须避孕，直接掌控她们的生育与身体自主权。和凌浩天一样，当妻子玉春被岁月筛薄了身子、筛稀了秀发，高若民便转向追求年轻带劲的桃乐珊。他先后占有这两个女人的青春与身体。然而，比凌浩天更为嚣张的是，当玉春已知晓高若民婚姻出轨，他非但没有悔意，反而更明目张胆的继续与桃乐珊交往。

有别于凌浩天与高若民，在商晚筠小说《人间·烟火》里，许百洲支配女性的目的远离了性欲变得更为功利。许百洲以父之名支配女儿许典尔。他将龙记杂货店老板与父亲的身份二合为一，算准许典尔为家业唯一承续者，底薪聘请她为杂工帮他顾店兼打杂，打烊后更乐得有人陪他喝茶。当许百洲遇上年轻、情场失意、经济能力又欠佳的陈谨治时，他有条件地娶她为妻。婚姻顿时变成交易。许百洲以不挨穷的所谓好日子换得陈谨治相许。而陈谨治则带着老板娘的身份去顾店，打烊后即便自己不好喝茶也会陪着许百洲对坐，等他把茶喝完。从许百洲、凌浩天、高若民的个案来看，金字塔性政治形式仿佛是男性无限替换女性后补的便利方式。杨可璐与玉春不敌岁月而老去？没关系，换个年轻的叶若兰与桃乐珊。许典尔离家出走吗？没问题，龙记还有陈谨治。

倘若直线式与金字塔式性政治形式呈现男性对女性的局部性支配——自由、话语权、劳动力、生育力、身体或是性的占有。那么，倒金字塔性政治形式则呈现父权崇尚者对女性的整体性支配与占有。在倒金字塔性政治形式里，多个父权崇尚者同时或前后支配着同一个女人。而那个女人则整个人变成了他（她）们的物。

《纽约春寒》里沈苓的母亲、《南门桥下的流水》里林秋美的父母、《静水大雪》里李蔷的母亲与林师父，他们皆是潘雨桐笔下的父权崇尚者。他们凭借身为父母的权力为女儿的婚姻大事做主，他们把女儿视为可换取名誉乃至钱财的货物。为了门当户对，沈苓母亲暗中安排沈苓嫁给留美富少柳若愚。为了保护家誉，林秋美父母把未婚先孕的林秋美许配给中年面贩苗天宝。然而，李蔷母亲与林师父则是为了钱，他们把李蔷许配给美国大厨周百祥。婚后，沈苓为柳若愚带着面具扮演夫唱妇随的贤妻。林秋美则变成苗天宝的面档助理帮他开档卖面。而李蔷她虽然生活无忧，但却像周百祥花钱买来陪自己度过晚年的伴侣。嫁娶在这层意义上，更像一宗买卖，而女性则是被半卖半送的货物。不管是卖方或买方，他们都掌控了支配该名女性的权力。

前述三篇小说，同时或前后支配同一名女性人物的人皆是其父母及丈夫。然而这并非倒金字塔性政治形式形成的唯一组合。只要有超过一名父权崇尚者存在，倒金字塔性政治形式就有形成的可能。潘雨桐那篇《那个从西双版纳来的女人叫蒂奴》便是最佳例子。它讲述女主角张小燕被其父亲、皮条客及嫖客所支配的故事。张小燕父亲是个重男轻女的男人。他为了儿子所编制的个体户美梦发疯发癫，把家庭负担完全丢给张小燕承担。皮条客陈洁则非常恋权，他为了巩固自身权威而将张小燕易名又当众掌掴她以杀鸡儆猴。而那些男性嫖客们，他们付了钱便嗜血的占有张小燕的性与身体。由此可见，崇尚父权的社会提供了性政治事件赖以发生的最佳环境。

三、性政治元素

根据亚伦·强森（Allan G. Johnson）的论述，父权体制是一个男性支配、男性中心、认同男性的社会。在此社会中男性具有权威位置，而男女之间的权力差异更是格外悬殊。来到现今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男性的权力从过去的（前工业时代）控制土地与女性生殖力转为控制资本与赚取家庭经济所需。因此，资本与经济成了

最新的权力衡量单位。但是，这并不彻底颠覆伦常观念赋予男性在家庭关系里的优越地位。与此同时也不瓦解男性通过施展暴力来形塑的权力。米利特便曾经表示，男性通过“性”去施暴是父权体制非常明显的强权形式，“强奸”体现了这个强权形式最充分的暴力（1999，页66）。如此一来，在父权社会这个最佳环境里，经济、伦常孝悌观念或暴力便成了性政治事件的推动元素。它们与父权的结合强化了性政治事件发生的可能。只要仔细分析潘雨桐与商晚筠小说的性政治事件，上述元素便无所遁形。

先来谈谈暴力。在潘雨桐与商晚筠小说中由纯暴力元素造成的性政治事件数量极少，但它对女性带来的伤害绝不容忽视。商晚筠《痴女阿莲》里的阿莲与潘雨桐《绿森林》里的杨美心，她们都是暴力性政治的受害者。阿莲的弟弟白定，为了要阿莲听从其指示便对阿莲动粗。他狠狠地抓开阿莲的手指、扳开她的手掌、掌掴她粗重耳光、斥责她、强行使劲拉扯她的胳膊赶她上岸，还大力扯紧她的头发来拖拉她。阿莲因此在白定的友人面前受尽身体发肤与尊严的伤害。另一边厢，暴力性政治则直接夺去杨美心年轻的生命。苏禄土匪持枪劫舍那晚，他们把杨美心先奸后杀。女性因此成了暴力性政治底下的断魂人。

女性既然被陌生人拿去了性命，那么安排至亲来掌控她们的自由似乎就合情合理了。前文曾经论及林秋美、杨可璐、秋妹皆是自由被剥夺的女性。必须注意的是，剥夺她们的人皆是她们的至亲。将林秋美当礼物一样送给苗天宝为妻的人是其父亲。强制杨可璐避孕的人是其丈夫。限制秋妹不许穿戴花布纱笼，而必须穿上海装布料的人是其家婆。由此来看，父女、夫妻、婆媳，这些伦常关系成了直接导致女性被剥削的关键。家庭伦理观赋予父亲、丈夫、家婆比女儿、妻子、媳妇更高的权力与地位，导致后者被前者所支配。因此，教条式的伦常观成了性政治的帮凶。

有别于伦常与暴力，资本主义抬头让经济成为最容易造成性政治事件的元素。商晚筠《人间·烟火》的许百洲，潘雨桐《烟锁重楼》的凌浩天以及《静水大雪》的周百祥，他们皆是经济条件丰厚的男性。许百洲是杂货店老板，凌浩天是大学讲师，周百祥有半份北京楼餐厅股权，他们都收入可观。正因如此，许百洲才得以答应陈谨治给她好日子过。另一方面，凌浩天才有能力在负担家庭之余又代替叶若兰缴付房租。而周百祥，他才得以吸引林师父教唆李蔷母亲把女儿“卖”给他¹。经济效应因而派生出陈谨治这位挂名妻子，并制造了叶若兰这名年轻情妇。另外，更导致李蔷变成被母亲变卖的货物。挂名的婚姻、见不得光的私情、类似人肉贩卖的交易，这全是女性被支配的开始。

性政治元素不仅单独出现。更多时候，它们相互结合成更有力的联结，加深性政治事件发生的可能。从这方面看来，经济是最具弹性的元素。它非常容易与暴力或伦常孝悌观念结合起来造成性政治事件。经济与暴力的结合综合体现男性的兽欲。潘雨桐《咀嚼死亡》的叙述者“他”还有《逆旅风情》的陈宏，他们皆是粗暴的买春者。在性交易关系里，“他”让自己化成一头食肉兽，把那些风月女性当成猎物来狼吞虎咽。《咀嚼死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那就是，在“他”狼吞虎咽他的猎物时，他有着拒绝关灯（抑或其实是很想开灯）的癖好。这显然说明他希望在明亮之中

¹ 有关李蔷母亲“卖”女的精彩论述可参考林春美(2009b)。

欣赏猎物被自己狼吞虎咽的挣扎与痛苦。“他”要用自己的眼睛再次咀嚼吞咽他的性爱猎物。这种近乎变态的欣赏癖，突显了“他”极致的性暴力倾向。然而，陈宏虽然没有类似的欣赏癖好。但他却是个为达至性满足，就算以暴力手段弄疼女性也在所不惜的男人。为了与他的月租性伴侣露嘉西雅发生性关系，陈宏在她毫无预警下把她推到。然后，拧她的手到背后，压她的头脸在地板上，把她的长发拨到一边，将她的下身翻掀扭曲成怪异的姿态，才开始像禽兽般蚕食她的身体。《逆旅风情》最终将陈宏塑造成一个性无能者，这未尝也是一种对他性暴力倾向的惩罚。“他”与陈宏，他们都以金钱来获取女性的身体，并在性交易过程中粗暴对待相关女性。男性通过支配女性的经济来支配女性的性，并以暴力手段来延续它。

另一方面，经济与伦常孝悌观念的结合则体现了女性在“尽孝爱悌”的美名下被遮蔽的不幸²。女性经常为了家庭经济所需，不得不接受另一名男性的经济支配来供给家里。潘雨桐《天凉好个秋》的束庆怡，《何日君再来》的玉娇，还有《雪茄玛渡头》的娜芙珊，她们都是为了家庭而接受另一名男性经济支配的女性。束庆怡为了让父亲治病以及让弟弟升学，她接受伍时勳丰厚的礼金嫁他为妻。而玉娇，她为了多寄些钱回家给有困难的父母及弟妹，不惜与冈田贞夫进行性交易。至于娜芙珊，她则为了养活孩子、妹妹以及母亲而出租自己的性与身体。《纽约春寒》里的沈苓，她是在经济满足并且门当户对的条件被其母亲有意安排嫁给柳若愚。婚后，她虽然厌恶与柳若愚双栖双宿。但她却因为自己已是柳若愚之妻，是他的人了，而继续接受他的经济支配与他维持夫妻关系。伦常孝悌的关系与观念迫使女性接受男性的经济支配。而性政治事件才因此有机会发生。

经济不仅能各别与伦常孝悌观念或暴力结合成性政治元素。它们更能三者合而为一，以巩固彼此。潘雨桐小说《那个从西双版纳来的女人叫蒂奴》与《野店》便是最佳例子。前者的女主角张小燕，她为了家人而出卖肉体换取金钱。在卖淫的日子里，她除了被嫖客所支配，更被皮条客陈洁暴力对待。陈洁当众对她动粗，又在她妹妹面前奚落她使她难堪甚至尊严尽丧。女性在父权社会里原已处于边缘处境，性政治元素的相互结合则更进一步将她们推向边缘的中心。至于《野店》里的苏丝玛，她是为了三餐温饱才答应帮忙林阿成打杂的。谁知，她却被林阿成强暴更为他生下了小孩。后来，她便轮回于接受林阿成的经济支配来养活自己与孩子的循环之中。在父权社会里，男性掌握经济优势连带掌握支配女性的优势。事实中，林阿成对苏丝玛的支配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而伦常孝悌观念与暴力元素的出现则更进一步巩固了这个支配的结构。由此可见，经济、伦常孝悌观念、暴力都是推动性政治事件之所以形成的元素。

² 林春美（2009a）对潘雨桐小说中被赞美的母亲形象的讨论对此论点启发极大。

四、结语

综上所述，潘雨桐与商晚筠小说的性政治问题综合呈现一个复杂面貌。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权力不公乃至父权体系强大的话语霸权，都提供了男性以及父权崇尚者支配女性的条件。随着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到来，经济成为社会生活新要素。经济资源的差距，加深男女之间的权力差异（亚伦·强森，2008，页78-80）。然而，在社会转型中仍被保留下来的伦常孝悌观念，则巩固了上述的权力差异问题。另一方面，历代皆难以根除的暴力行为继续提供施暴者形塑权力的机会。这些层次各异的权力问题综合形成米利特所言的权力结构。它是政治运作的核心。正因如此，它让男性或父权崇尚者支配女性的关系具有了政治因素。而这正是潘雨桐与商晚筠小说中的性政治秀。

参考资料

- 何启智、林春美（2015）。男性气质的建构与消弭：潘雨桐与李天葆小说的个案研究。《华文文学》，3，页120-124。
- 金进（2011）。论马华作家潘雨桐的小说创作。《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页21-25。
- 凯特·米利特（1999）。《性的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林春美（2009a）。男性注视下的女性幻象：从静水到野店说潘雨桐。《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雪兰莪：大将出版社。
- 林春美（2009b）。女身境地：小论1990年代潘雨桐小说的“女”“性”。《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雪兰莪：大将出版社。
- 林春美（2009c）。从华玲到吉隆坡：商晚筠的女性之旅。《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雪兰莪：大将出版社。
- 潘雨桐（1987）。《因风飞过蔷薇》。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
- 潘雨桐（1989）。《昨夜星辰》。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
- 潘雨桐（1996）。《静水大雪》。柔佛：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 潘雨桐（1998）。《野店》。柔佛：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 潘雨桐（2002）。《河岸传说》。台北：麦田出版。
- 商晚筠（1975）。秘密。《蕉风》，273，页62-69。
- 商晚筠（1979）。云深不知处。《新潮》，76，页102-104。
- 商晚筠（1991）。《七色花水》。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商晚筠（1992）。《痴女阿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商晚筠（2003）。《跳蚤》。士古来：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
- 亚伦·强森（2008）。《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台北：群学。